

泰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涉华叙事 及中国形象的构建

李 涛 陶梦婷 王雅怀

摘要：泰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载体，通过“他者”视角构建了具有阶段性与多重面向的中国形象：从商贸繁荣的文明古国，到积贫积弱的近代衰落帝国，再到经济迅速崛起的当代中国，同时塑造了朝贡贸易下的友好邻邦、文化传播者以及重要贸易伙伴的周边地区形象。这一“他塑”形象的生成，既源于泰国构建自身主体性叙事的需要，也受到泰国主体性核心价值体系、西方中心主义叙事传统，以及教科书编者主观认知与专业局限的共同影响。教材涉华叙事呈现出“古代丰满、近现代单薄”的结构特征，导致其所构建的中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局限性。深入剖析泰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及其形塑动因，不仅有助于理解泰国对华认知的形成逻辑、推动两国良性互动与长期合作，亦可通过“以他观己”更有效地进行“自塑”，助力在泰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关键词：泰国历史教科书；涉华叙事；中国形象；中泰关系

收稿日期：2025—09—03

作者简介：李涛（1977—），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陶梦婷（2001—），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2025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泰国国别研究；王雅怀（Thong-Ome Pataharida, 1999—），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泰国籍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泰国国别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东南亚国家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涉华重大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1ASS006）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泰国地处中南半岛核心地带，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与战略合作伙伴，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周边外交战略的重要交汇点。作为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中泰两国自古以来的友好往来历史与深厚民意基础一直是推动“中泰一家亲”这一双边共识持续深化的强大动力。自1975年中泰两国正式建交以来，双方在政治互信、经济互利、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等多维度的合作不断深化。2012年，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泰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铁路、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成果斐然，为泰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并为区域互联互通和一体化进程提供了有力支撑。2020年，两国提出共建“中泰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标志着双边关系进入更加紧密的新阶段。然而，由于受到冷战时期的政治阵营归属、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泰国政坛持续动荡，以及近年来中国在泰国投资活动所引发的对华经济依赖的忧虑等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泰国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呈现出认知滞后和视角片面等特点。

历史教科书作为文化传播的关键介质，在塑造国民价值观和知识体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泰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涉华叙事不仅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泰国的对华立场与政策变化，而且展现了泰国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倾向和演变趋势。因此，深入剖析泰国现行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构建，纠正偏差、促进涉华叙事的正向化与积极化，对于培养泰国青少年的对华认知与情感认同、巩固“中泰命运共同体”的民意基础，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与现实价值。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泰国基础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泰国的课程改革和泰国教育的政治化方面。贾辰飞认为，泰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经验对中国具有借鉴价值，而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应作为前车之鉴。^①泰国学者西提猜·苏卡塔（Sittichai Sukata）等分析了泰国如何根据以

^① 贾辰飞：《泰国基础教育改革对中国的启示》，《西部学刊》，2019年第9期，第9—15页。

民族、国王、宗教和文化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理念来编写小学4—6年级的社会学与历史教科书。^①国内外学者对于泰国历史教科书中所呈现的中国形象研究并未充分展开,仅有零星成果。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的彭纳帕·蒙萨尔(Pennapa Monsaard)分析了20世纪40—90年代泰国小说中的华人形象,认为他们从最初的“他者”“罪犯”“敌人”“黑帮”等,逐渐演变为“暹罗华人”“企业家”,并探讨这一形象转变与历史背景的互动关系,从而阐释了在泰华人移民群体不断适应并融入泰国社会的过程。^②杨阳以泰国AJT出版公司出版的泰国2015版中学历史教材为研究对象,指出泰国认可中华文明对其社会的积极影响,努力修正以往的历史偏误,高度赞扬华人华侨在泰国发展进程中的贡献与成就,强调随着两国友好交往的不断深化,泰国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将更加深刻与全面。^③赵娟以泰国美克出版社出版的现行小学、初中、高中人文教科书《社会研究、文化》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对中国形象的叙述与认知,总结出“繁荣昌盛的‘东方文明古国’形象”“馈赠丰厚的‘遥远邻国’形象”以及“历史悠久的‘睦邻友善’形象”,并指出教科书中缺乏对于当代中国形象的书写。^④为进一步拓展和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本文拟整理并分析泰国现行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重大涉华叙事内容,着力探讨这些重大涉华叙事内容呈现出何种特点、构建了怎样的中国形象、与中国官方的历史叙述存在哪些异同、是否存在明显的偏误或歪曲之处、其构建中国形象的生成逻辑为何等议题。

① Sittichai Sukata and Nadhawe Bunnag,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ai Nationalism in Social Studies and Historical Textbook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Graduate Studies*, Vol. 4, No. 1, 2015, pp. 126-136.

② Pennapa Monsaard, "Image of the Chinese in Thailand in Thai Novels 1969-1980", MA Thesi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2007, pp. 191-195.

③ 杨阳:《当代泰国人对中国的认知与评价——基于泰国2015版中学历史教材的分析》,《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6期,第74—77页。

④ 赵娟:《从周边看中国:泰国人文教科书〈社会研究、文化〉中的中国形象》,《海外文摘》,2021年第24期,第2—3页。

二、泰国教育体制和历史教科书

教育体制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实现既定的教育目标而建立的教育机构、教育规范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涵盖教育组织结构、管理体系、课程设置、法律法规和资源分配等内容,是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文化遗产、人才培养和经济发展。教育体制为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提供了基础框架与指导原则,而历史教科书则是一国教育体制在历史教育领域具体落实的关键工具,同时也是实现教育目标、传承文化和塑造国民认同感的重要载体。

(一) 泰国教育体制的发展历程

泰国的基础教育经历了从传统寺院教育到现代学校教育的模式转型,在此过程中,泰国既吸取了西方教育理念,又兼顾了本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需求,逐步构建起现代化教育体系。^①

古代泰国的基础教育以寺庙、宫廷和家庭为主要载体,寺院由僧侣为平民男孩传授佛教经文、道德伦理及基础读写,宫廷面向贵族提供文化艺术教育,而家庭则由父母传授生活与职业技能。^②

19世纪上半叶,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张促使暹罗精英探索自强御侮之道。在此背景下,泰国教育制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奠基人——朱拉隆功国王(即拉玛五世)采取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措施,在推动教育世俗化的基础上积极引入西方教育模式,奠定了泰国系统化的学校教育制度基础。1871年,泰国建立了第一所面向贵族子弟的皇家小学。同年,国王下令编纂了第一本现代泰语教科书《综合基础知识》(หนังสือมูลบทบรรพกิจ)。为普及教育,泰国自1884年起在多座寺庙内设

① 蔡昌卓主编:《东盟基础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5页。

② Waraiporn Sangnapaboworn,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Education in Thailand and Its Present Challenges: From Quantity to Quality through Effective Management", *Universalization of Primary Education in the Historical and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Chiba: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7, p. 260.

立平民学校，因此这些学校通常以“Wat”（寺庙）作为学校命名前缀。此后，为克服僧侣非专业教师的局限性，政府便在全国推行专职教师培训计划以提升教育质量，并设立了军官学校、医学院、师范培训学校等专业院校，逐步实现了教育体系从传统寺院教育向现代化学校教育的转型。随着学校数量的增加，对教育机构进行规范化管理变得尤为必要。1887 年，朱拉隆功国王下令设立专门的教育管理机构，并在 1892 年更名为教育部，标志着泰国教育体系正式制度化。1898 年，朱拉隆功国王颁布了第一部《全国教育计划》，将教育推广至外府及乡村，为基础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奠定了基础。^①朱拉隆功国王去世后，其子拉玛六世仍十分重视国民教育的推广普及与性别平等，并且将教育作为传递“民族、君主、宗教”三位一体思想的重要途径。1921 年，首部《初等教育法》颁布，规定 7—14 岁的儿童必须接受免费的初等教育，而 18—60 岁的学习者需缴纳“教育税”以支持学校运营。^②

1932 年，泰国政治体制由君主专制转为君主立宪制，新上台的人民党怀有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理想，提出“人民党将使人民受到充分教育”的口号，将教育确立为构建现代化民主社会的六大支柱之一。《1932 年全国教育纲要》在扩大基础教育规模的同时将义务教育年限增加至 6 年，包括 4 年普通初等教育和 2 年特殊教育（强调学习农业、畜牧业、手工艺及商业等职业技能）。^③《1936 年全国教育纲要》将义务教育年限缩减至 4 年，希望以缩短年限突破教育资源限制，让更多人能接受义务教育。

1960 年，沙立·他那叻军人政府颁布《国家教育计划》，根据地方实际条件将义务教育年限从 4 年延长至 7 年，确立了小学 7 年、初

① 贾辰飞：《浅议泰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与改革》，《文学教育（上）》，2020 年第 1 期，第 181 页。

② 贾辰飞：《泰国基础教育改革对中国的启示》，《西部学刊》，2019 年第 9 期，第 10 页。

③ Waraiporn Sangnapaboworn,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Education in Thailand and Its Present Challenges: From Quantity to Quality through Effective Management”, *Universalization of Primary Education in the Historical and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Chiba: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7, p. 263.

中3年、高中2年的学制。^①从20世纪60年代起，泰国教育改革都坚持从本国及本地区实际水平出发，1978年又将义务教育改为6年，1990年又延长至9年。^②1966年，《小学移交地方行政机构法》实施，将首都圈外原属教育部管辖的两万多所小学划归内政部下属省级行政机构管理，而该机构官员既不重视教育，也不掌握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直接导致教师待遇不佳、教育质量下滑。^③1973年，学生运动推翻他依·吉滴卡宗军事独裁政府，开启了短暂民主化时期。民主的重生使得泰国教育工作者重新思考和设计适应社会新需求的教育体系。汕耶·探玛塞政府成立了基础教育改革委员会，提出以“面向生活与社会的教育”（Education for Life and Society）为主题的教育计划。^④尽管该计划因内容过于激进且与当时社会现实脱节而未能全面实施，但其核心理念被逐步纳入泰国基础教育体系，为后续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在政治风潮的推动下，泰国政府于1977年将学制改为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该学制沿用至今。^⑤1980年，泰国《国家初等教育法》将基础教育管理权从内政部重新划归教育部，以解决此前因政治干预导致的教育质量下降问题，推动了教育改革的新高潮。泰国1997年《宪法》中首次明确了发展教育和受教育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应有的权利，指出所有公民均有接受12年基础教育的平等权利。^⑥

1999年《教育法》的颁布为发展和改革教育提供了法律依据，标

① Waraiporn Sangnapaboworn,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Education in Thailand and Its Present Challenges: From Quantity to Quality through Effective Management", *Universalization of Primary Education in the Historical and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Chiba: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7, p. 264.

② 冯增俊：《战后泰国教育发展的基本经验、问题及展望》，《教育比较与借鉴》，1996年第6期，第27页。

③ Waraiporn Sangnapaboworn,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Education in Thailand and Its Present Challenges: From Quantity to Quality through Effective Management", *Universalization of Primary Education in the Historical and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Chiba: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7, p. 265.

④ Ibid., p. 266.

⑤ 冯增俊、李志厚：《泰国基础教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⑥ 同上，第10页。

标志着泰国教育新纪元的到来。^①为落实1997年《宪法》与1999年《教育法》推动全民教育的要求,泰国于2003年正式成立基础教育委员会办公室(Office of the Basic Education Commission, OBEC),负责牵头制定基础教育政策、统一核心课程和教育质量标准以及监管学校教学情况。进入21世纪后,泰国政府继续修订教育政策,2008年颁布了《基础教育核心课程》,通过立法手段确立课程内容,确保国家发展目标与教育目标的一致性。2009年,泰国政府颁布了《国家教育计划修订版(2009—2016)》,并于2016年推出了新的《国家教育计划(2017—2032)》。这些政策旨在进一步完善基础教育体系,以培养符合新时代需求的全面发展型人才。

泰国教育体制的发展与转型,始于为抵御外敌、建设现代国家而进行的被动改革,继而转向以推动国家发展、提升全球竞争力及实现社会公平为目标的主动规划,其发展脉络反映了泰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

(二) 泰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涉华内容的分布

泰国教科书由教育部下设的课程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但内容通常由商业出版社根据教育部制定的各科课程大纲进行编撰,因此,泰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常出现一纲多本的情形。^②根据泰国《2008年基础教育核心课程》的规定,其基础教育有8门核心课程:泰语、数学、社会研究、宗教与文化、健康与体育教育、艺术、职业技术和外语,其中历史被归类于“社会研究、宗教与文化”课程之中。^③小学阶段历史课程为40学时,占该阶段核心课程总学时的4.76%;初中阶段历史课程为40学时,占该阶段核心课程总学时的4.52%;高中阶段历史课程为80学时,占该阶段核心课程总学时的4.9%。

本文以泰国阿科松教育出版集团(Aksorn Education Publishing

① 冯增俊、李志厚:《泰国基础教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② 蔡昌卓主编:《东盟基础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页。

③ 泰国基础教育委员会办公室:《2008年基础教育核心课程》, http://academic.obec.go.th/images/document/1559878925_d_1.pdf, 第23页。

Group) 下属的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 (Aksorn Charoen Tat Company Limited) 出版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为主要研究对象, 该系列教材被泰国大多数学校采用, 其出版及使用情况见表 1。具体来看, 小学一年级至初中三年级, 每个年级各使用一本历史教材; 高中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 统一使用《泰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两本教材。在课程内容的编排上, 该系列历史教材以泰国本国历史的发展为主线, 涉及他国的内容主要围绕与泰国的历史互动展开。

表 1 泰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出版及使用情况

年级	书名	出版时间
小学一至六年级	《历史》 (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	2024年
初中一年级	《历史》 (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	2024年
初中二年级	《历史》 (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	2016年
初中三年级	《历史》 (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	2012年
高中一至三年级	《泰国历史》 (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ไทย)	2024年
	《世界历史》 (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สากล)	2024年

资料来源: 根据泰国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出版的历史教科书整理汇总。

三、泰国现行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涉华叙事

历史教科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媒介, 承载着官方的历史观和政治立场。泰国现行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涉华叙事深植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土壤之中, 反映了中泰两国历史关系的复杂性, 也对泰国青少年的对华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泰国现行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涉华叙事

泰国现行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涉华叙事集中于小学高年级、初中

以及高中历史教材中，主要以零片段的形式镶嵌于泰国历史发展的主线之中。

小学一年级的历史教科书以泰国小学生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华裔家庭的故事，间接展现了中国人移居泰国谋生并与泰国当地社会融合的历史进程。^①二年级教材提及了 19 世纪普吉岛中国矿工与当地发生冲突，查龙寺住持龙婆占（Luang Por Cham）带领当地人抵抗的历史事件。^②小学三年级的教科书追溯了华人群体移居泰国的历史，中华传统文化随着华人在当地的融入也在泰国社会留下了深刻烙印。^③四年级的教材叙述了泰国学习中国制陶工艺，进而发展出独具本土特色的“宋加洛陶器”。^④五年级教材中的第二章以中国京剧花旦与龙纹纹样作为背景图案，详细阐述了中华文明对泰国饮食文化、生活习惯、贸易与航海、宗教与文学等领域产生的影响。^⑤小学六年级教材中写道，“东南亚国家的文化基础来源于中国和印度，其中越南受中华文化影响最为深远”^⑥。

在初一至初二年级的历史教科书中，多次强调了泰国历史上多位国王重视对华朝贡贸易以及对华发展良好关系，^⑦教科书概述了从中国商朝至新中国成立这一巨大历史跨度的文明发展轨迹，^⑧提及了忽必烈、司马迁、周达观等重要历史人物，对诸如《史记》《真腊风土记》等著作，^⑨以及《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汉演义》

① 乌提猜·孟辛：《历史》（小学一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 2024 年版，第 17—18 页。

② 乌提猜·孟辛：《历史》（小学二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 2024 年版，第 51—52 页。

③ 乌提猜·孟辛：《历史》（小学三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 2024 年版，第 27—32 页、第 43—47 页。

④ 乌提猜·孟辛：《历史》（小学四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 2024 年版，第 74—75 页。

⑤ 乌提猜·孟辛：《历史》（小学五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 2024 年版，第 17—18 页、第 25—30 页、第 48—50 页。

⑥ 乌提猜·孟辛：《历史》（小学六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 2024 年版，第 29—30 页。

⑦ 乌提猜·孟辛、纳隆·普安皮：《历史》（初中二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 2016 年版，第 16 页、第 43 页、第 78 页、第 83 页。

⑧ 同上，第 146 页。

⑨ 乌提猜·孟辛、纳隆·普安皮：《历史》（初中一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 2024 年版，第 3 页、第 23 页、第 64 页。

等中国文学作品也都有所介绍，^①对于明清故宫、兵马俑、长城等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儒家文化、医学、航海、制陶技术、四大发明等均有介绍，^②兼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叙事。初3年级的教科书阐述了中泰两国对朝贡贸易的不同解读，并介绍了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大量沿海居民迁移至泰国寻求生计的历史现象。中国移民与泰国社会深度融合，华人在商业领域表现活跃，一部分人甚至担任了泰国税务官员并获得贵族称号。^③教科书中对华人移民为泰国社会提供劳动力、巩固政权和抵御外来侵略等方面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对中国现代史的讨论中，教科书选取了中美建交、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泰建交等重要事件进行简要介绍，篇幅相对有限。^④

泰国高中“世界历史”课程内容的编排，分为“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两个板块，围绕不同主题进行深入探讨。书中介绍了中国从旧石器时代至金属时代的历史演进，尤为详细地阐述了中华史前文明。^⑤在“东方世界的重要文明”部分，采用大量篇幅专门梳理中国从商朝至清朝的历史脉络，概述各个朝代的特征、时间及重大历史事件，如商朝的甲骨文与青铜器、周朝的“天命”理念、秦朝建立帝制与修建长城、汉朝对儒家思想的推崇及张骞出使西域、唐朝的盛世景象与玄奘西行取经、元朝的领土扩张、明朝郑和远洋航行以及清朝的衰落等。^⑥值得注意的是，高中《泰国历史》教材对于“泰族起源”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补充，综合展示了各国学者对泰族起源的多种见解，其中包括一种曾被广泛接受的概念——泰族是由于受中原汉族的压迫而被迫向南迁移。^⑦这一说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泰国民族主义

① 乌提猜·孟辛、纳隆·普安皮：《历史》（初中二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162页。

② 同上，第163—165页。

③ 乌提猜·孟辛、纳隆·普安皮：《历史》（初中三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5—26页。

④ 同上，第87页、第178页。

⑤ 乌提猜·孟辛、阿楠猜·劳哈潘图、参猜·素婉卜、查克里·素宛纳：《世界历史》（高中），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2024年版，第13页、第73—74页。

⑥ 同上，第13页、第75—79页。

⑦ 纳隆·普安皮、乌提猜·孟辛：《泰国历史》（高中），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2024年版，第40—48页。

者作为鼓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工具。该套教材摒弃此前存在于旧版历史教科书中的“大泰民族主义”偏见，引入了基于考古、历史文献、语言学与人类学研究的证据，充分纠正了这一历史认知偏差，其客观的叙述有助于泰国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观。

（二）泰国现行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涉华叙事的特点

鉴于中泰两国在历史上的频繁互动和悠久的往来经历，泰国历史教科书中涉华叙事内容相对他国而言较为丰富，零星散布于泰国本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书中的涉华叙事内容主要展现出以下三个显著特征。

一是模糊处理敏感历史事件。首先，书中关于近代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存在美化倾向。例如，书中写道：“西方国家的到来，使中国经济更加工业化，建立了重工业，如造船、钢铁，以及轻工业，如棉花纺织。”^①这种将西方国家的入侵简单地等同于中国工业化推动力的描述，忽视了西方殖民行为的侵略和剥削性质，存在显著的主观和片面倾向。尽管西方列强的入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但却是以极大的社会成本和民族苦难为代价的。其次，词汇选择带有明显的“去暴力化”“美化”色彩。教材在描述西方列强和日本侵华行径时，未使用“侵略”（รุกล้ำ）等明确殖民性质的词汇，而是采用“进入”（เข้ามา）等中性词汇进行描述。^②同样，在阐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部分，侧重于描述纳粹德国在欧洲的侵略行径，对日本在亚洲的侵略事实则同样以中性词汇“扩张势力”（ขยายอำนาจ）一带而过。这种叙述方式弱化了西方列强与日本侵略者的暴力与非正义性质，极有可能导致泰国学生对殖民主义历史事件产生错误认知。

二是部分涉华叙事内容存在偏差。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历史时

^① 乌提猜·孟辛、纳隆·普安皮：《历史》（初中二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122页。

^② 乌提猜·孟辛、纳隆·普安皮：《历史》（初中三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90页。

期划分与特征的描述问题。总体而言，泰国中小学教材中关于中国古代历史时期划分与特征的描述大体准确，但也存在若干具体时间或事件表述不清问题。譬如，有教科书提及“隋朝（公元589—618年）”^①，实为公元581—618年^②；“元朝（公元1279—1368年）”^③，应更正为公元1271—1368年^④。初中二年级《历史》教材中描述道：“1920—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因此中国改为实行共产主义制度，并一直维持至今”^⑤，里面存在诸多错误。首先，所提到的“1920—1949年”时间范围与实际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1921年）不符。其次，根据中国现行宪法的规定，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因此，在描述现代中国的社会制度的时候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社会主义制度”（ระบอบสังคมนิยม），而非文中使用的“共产主义制度”（ระบอบคอมมิวนิสต์）。第二个方面是有关中国台湾地区的表述及所配的亚洲地图出现错误。例如，有教科书写道：“越南战争结束后，泰国改变了对华政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于佛历2518年（1975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合法代表。”^⑥初中二年级历史教材所附的亚洲地图，对中国台湾地区的标识与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主权国家同类。^⑦在其后所列的亚洲国家列表中，将中国台湾地区赫然列入，虽在“台湾”（ไต้หวัน）一词后标注了“中国的一部分”（ส่วนหนึ่งของจีน）的字样，但以上种种错误极易误导泰国中小学生对台湾的错误认知。第三个方面是教科书在阐述中国改革开

① 乌提猜·孟辛、阿楠猜·劳哈潘图、参猜·素婉卜、查克里·素宛纳：《世界历史》（高中），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2024年版，第79页。

② 根据《中国历史纪年简表》，隋朝存在时间应为公元581年至公元618年。

③ 乌提猜·孟辛、阿楠猜·劳哈潘图、参猜·素婉卜、查克里·素宛纳：《世界历史》（高中），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2024年版，第79页。

④ 根据《中国历史纪年简表》，元朝存在时间应为公元1271年至公元1368年。

⑤ 乌提猜·孟辛、纳隆·普安皮：《历史》（初中二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120页。

⑥ 乌提猜·孟辛、纳隆·普安皮：《历史》（初中三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87页。

⑦ 乌提猜·孟辛、纳隆·普安皮：《历史》（初中二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116—117页。

放以及改革时期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时，错误地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视为同义概念，相关错误表述如下：“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开始实行现代化政策，即发展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开放经济特区，开放外国投资，并将国家改变为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体制”^①。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推进，国家在关键领域和核心产业中依然发挥主导作用，同时积极鼓励与支持私营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为了正确地向泰国学生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真实面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独特性，亟须对这一错误表述予以补充与修正。

三是涉华叙事框架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失衡与时效性滞后。首先，涉华叙事内容的选择存在显著的“厚古薄今”倾向，偏重于强调中国古代文明与成就，忽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中国近代史确实充斥着外来侵略和内部动荡，但并不缺乏积极的变革尝试与历史进步。然而，泰国中小学历史教材对于1840—1949年间的诸多标志性事件，如洋务运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以及抗日战争等，都未作过多介绍，且普遍采用以“被动”“衰落”为主导的单一视角，忽略了近代中国人民在逆境中追求民族独立、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的主体实践。其次，泰国中小学历史教材对当代中国的讨论寥寥无几，简要提及新中国成立及改革开放，关于当代中国的阐述也主要聚焦于经济维度。再次，教科书对于中国在21世纪快速发展的描写存在时效性滞后。这一现象并非仅限于涉华内容，而是泰国历史教科书普遍存在的问题，即对世界各国的最新发展和动态变化都缺乏充分的介绍。

四、泰国现行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塑造的中国形象

国家形象不仅映射了国际社会对本国的认知与态度，而且也是双边或多边关系构建与推进的关键要素。国家形象塑造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它受到历史记忆、政治倾向、经济利益以及文化认同等多方

^① 乌提猜·孟辛、纳隆·普安皮：《历史》（初中二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122—123页。

面因素交织的影响，体现了某一内容被该国文化的解读和评价。泰国基础教育阶段历史教科书中所呈现的中国形象主要有以下五种类型。

（一）古代中国：历史悠久、文明璀璨、商贸繁荣的文明古国

在泰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涉华叙述中，对古代中国的阐述占据比重显著。这些叙述塑造了一个具有深厚历史底蕴、辉煌文明成就、繁荣贸易往来的文明古国形象，对泰国及周边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高中《世界历史》教科书对于中国的悠久历史及其作为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认可。书中明确写道：“东方世界是人类长期居住并创造文明的地方，是世界重要的文明发源地，尤其是中国和印度。”^①《世界历史》一书较为系统地整理了中国从旧石器时代到清朝的漫长历史进程，重点强调古代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以元谋人、北京人、半坡文化、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以及青铜器文化等考古发现为佐证，^②有效地展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丰富性。教科书还投入大量篇幅专门梳理中国从商朝至清朝的历史脉络，精要概述各个朝代的特征、时间及重大历史事件，相关篇幅举例如下：

中华文明的历史记载始于约 3700 年前的商朝时期。当时人们开始发明象形文字，并将其刻在兽骨和龟甲上，这些文字被称为“甲骨文”或“卜辞”，这些文字是现代汉字的起源……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延续了近 900 年，它奠定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中华文明，其中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是统治者必须获得“天命”，即君权神授……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位皇帝，他极大地扩展了疆域，使中国拥有了辽阔的国土，并开创了皇帝制度，这一制度在此后延续了两千余年，成为中国古代社

① 乌提猜·孟辛、阿楠猜·劳哈潘图、参猜·素婉卜、查克里·素宛纳：《世界历史》（高中），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 2024 年版，第 4 页。

② 同上，第 13 页、第 74 页。

会的基本统治形式……汉朝皇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即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带），张骞所走的路线，在19世纪末被德国地理学家命名为“丝绸之路”，在此后一千多年间，这条陆上通道一直是亚洲与欧洲之间通商往来的重要通道……隋唐时期，中华文明再度迎来鼎盛，其中唐代尤甚，其都城长安（今西安）被誉为当时的世界中心，这一时期也被视作中国的黄金时代……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与满族建立的清朝，均曾统治中国。蒙古的崛起始于成吉思汗，而最终完成对中国征服的是其孙忽必烈。蒙古帝国曾将势力扩展至东欧地区。满族所建的清朝，初期也曾大幅开疆拓土，但后期因皇帝昏庸无能、吏治腐败而日渐衰微。^①

这一系列的历史概述综合构建了一个历史悠久且文化底蕴深厚的古代中国形象。

其次，泰国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构建了一个灿烂辉煌的文明古国形象，并充分肯定中国史料对于泰国及其他国家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书中提道：“在文献方面，中国非常重视历史记载，有在兽骨、龟甲、竹简、丝绸、纸张等载体上记录历史的传统。历朝历代都会整理历史，直至最后一个朝代——清朝，这使得中国拥有完整丰富的历史文献。此外，还有诸多关于其他国家的记载，如日本、朝鲜、琉球等，许多国家使用中国的历史文献来研究他们国家的历史。”^②中国历史资料的丰富完整，得益于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以及对历史记录和文化保存的重视。^③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乃至西方世界的贸易往来和文明交流，均在历代史官及学者的笔下得到了详尽的记载，保存于丰富的书籍和档案之中。例如，有教材提到中国古代文献记录了泰国史前的堕罗钵底国、罗斛国、真腊以及室利佛逝等东南亚古国，这些文献成

① 乌提猜·孟辛、阿楠猜·劳哈潘图、参猜·素婉卜、查克里·素宛纳：《世界历史》（高中），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2024年版，第75—79页。

② 乌提猜·孟辛、纳隆·普安皮：《历史》（初中二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161页。

③ 段立生：《泰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32—33页。

为泰国等多个国家了解及补充本国历史的重要来源。此外，教科书对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世界性贡献、秦始皇兵马俑与长城的壮丽、地震仪的发明、明清故宫、莫高窟等文化遗产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相关内容举例如下：

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有着深远影响，其代表性成就包括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指南针是世界上最早被发明的导航工具，最初用于祭祀或占卜活动，后逐渐发展为用于辨别方向的工具。早期主要应用于建筑选址、城市规划或风水布局，随后进一步发展为航海与旅行中的重要仪器。造纸术是一项对知识发展与传播具有重大意义的发明，诞生于汉朝。迄今有实物证据保存下来的最早的印刷书籍是《金刚经》。火药由中国发明，最初用于制作烟花爆竹，其后传入阿拉伯地区与欧洲，被用于制造战争武器。^①

此外，教科书中一再提到中国文化对泰国的深远影响，吞武里大帝、拉玛一世都认识到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中国卓越的治国理念，并下令翻译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至今都广为泰国人所熟知。

最后，泰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多次提起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及西方国家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航线进行贸易交流，构建了一个经贸繁荣的东方商贸大国形象。例如，有教材写道：“许多东方世界的重要商品，如丝绸，曾深受西方人喜爱。从罗马帝国时期开始，罗马贵族就喜欢用丝绸做衣服，使得罗马帝国不得不花费大量金币从中国购买丝绸”以及“在瓦斯科·达·伽马到达印度之前约 60 至 70 年，明朝的大规模船队在郑和（三保太监）的带领下，在公元 1405—1433 年间进行了 7 次海上探索，远至红海与非洲东部，使中国的商品，尤其是丝绸、

^① 乌提猜·孟辛、纳隆·普安皮：《历史》（初中二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 2016 年版，第 163 页。

瓷器、茶叶广受欢迎”。^①此外，教材中反复强调了中泰两国间的朝贡贸易，该部分内容将在分析中泰两国关系时进行探讨。

（二）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衰落帝国

相较于对古代中国的详尽叙述，泰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对中国近代史的阐述显著不足，呈现出一种以“衰落”为主导叙事的单一视角，且叙事内容存在因果关系线性化与简单关联特征，具体表现在简化历史动因、忽略互动关系以及弱化历史主体等方面，未能全面展现中国近代史的复杂性。其主要内容举例如下：

中国近代史始于19世纪的清朝，并持续至民国时期结束，时间跨度约为1800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中国国力渐衰，其原因既源于内部治理问题，也包括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最终，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败给英国。^②19世纪，西方国家与中国贸易往来频繁，茶叶是主要出口商品。但由于中国对西方商品需求有限，导致西方不满，遂向中国倾销鸦片。中国的禁烟运动引发了鸦片战争（1839—1842年），中国战败，被迫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此后，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利益掠夺。西方势力的涌入推动中国经济向工业化转型，出现了造船、钢铁等重工业，以及棉纺织等轻工业。尽管如此，农业仍是经济的基础，农民普遍面临贫困与无地问题。因此，土地改革成为国共两党争取农民支持的核心政策。^③

泰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还简化了中国近代若干具有重要、积极和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对于中国近代重要历史事件的深度和广度都没有

① 乌提猜·孟辛、阿楠猜·劳哈潘图、参猜·素婉卜、查克里·素宛纳：《世界历史》（高中），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2024年版，第89页。

② 同上，第15页。

③ 乌提猜·孟辛、纳隆·普安皮：《历史》（初中二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122页。

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泰国历史教科书中，对于中国推翻千年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以及新中国的成立这段伟大历史的描述仅以“中国早期是按照才能选拔统治者，后来历代王朝都实行帝制，由大臣辅助管理国家。1912年，中国实行共和政体。1920—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因此中国改为实行共产主义制度，并一直维持至今”^①来概述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并且还出现了时间、关键表述上的错误。因此，基于上述的片面视角，所呈现出来的近代中国形象是一个面临内忧外患的弱国形象。

（三）当代中国：迅速崛起的经济强国

泰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对于当代中国的介绍略显单薄，寥寥数笔所描绘出来的是一个由改革开放铸就经济辉煌的经济强国形象。关于当代中国的叙述主要集中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发展历程和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飞跃上，相关内容如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土地改革并推动农业与工业发展。然而，20世纪50年代末因自然灾害与管理失误，农业产量下降。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领导中国推行现代化政策，强调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全面发展，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逐步将国家调整为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自此高速增长，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等城市发展成为经济中心。当前，中国经济实力雄厚，实行市场经济体制。^②

有的章节直接写道：“如今，泰国人越来越热衷于学习汉语、日

^① 乌提猜·孟辛、纳隆·普安皮：《历史》（初中二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120页。

^② 同上，第122—123页。

语和韩语，这是由于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对泰国极为重要。”^①这也侧面肯定了中国经济实力的强大以及对推动泰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冷战后泰国的国际关系”小节中提到了“美国后来恢复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并承认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及“越南战争结束后，泰国改变了政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于1975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②

虽然有教科书简要提及中国加入联合国、中泰建交以及改革开放等关键历史节点，但缺乏对当代中国发展脉络的全面介绍，尤其是缺乏关于21世纪以来中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崭新面貌。相较于古代中国形象的立体丰满，该版本历史教科书对于当代中国的描述显得过于简略，主要聚焦于中国的经济崛起，且存在若干概念上的混淆乃至错误。因此，这些教材所塑造的当代中国形象显得较为单薄，未能充分展现中国在全方位发展与卓越成就，可能造成泰国学生对当代中国的认知局限。

（四）古代中泰关系：朝贡贸易下的合作伙伴与友好邻邦

泰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普遍贯穿了对中国古代贸易繁荣及经贸交流的详细叙述，尤其是关于中泰两国的朝贡贸易贯穿于几乎每册教材之中，具体内容举例如下：

泰国与外国的海上贸易自素可泰时期就已经开始，当时有中国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前来进行贸易。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贸易形式，即泰国与中国之间的朝贡贸易体系。^③泰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基于经济利益，两国间的贸易具有特殊性，称为朝贡贸易。如果一个国家派遣使节并携带贡品献给中国皇帝，中

① 乌提猜·孟辛、纳隆·普安皮：《历史》（初中二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107页。

② 乌提猜·孟辛、纳隆·普安皮：《历史》（初中三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87页。

③ 乌提猜·孟辛：《历史》（小学四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2024年版，第63页。

国将视其作为一种屈服和恭敬，以允许与该地开展贸易来作为回报。然而，泰国只是为了贸易而联系，并不是对中国的屈服。^①

从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泰国将朝贡制度理解为一种贸易手段，无关国家主权与主从关系，体现的是中泰两国在朝贡贸易中各取所需的利益考量。泰国教科书中的理性化阐释有助于泰国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两国在历史互动中的互利合作，进而促进对中泰传统友好关系的认知与传承。初中二年级教材中描写道：“吞武里王朝时期，泰国人和中国人有着相同的佛教信仰，吞武里大帝郑信本人也有中国血统。在泰緬交战时，中国商人也为其提供食物补给。吞武里大帝郑信信任中国，让中国士兵驻守边境。”^②此处记述的中泰交往，不仅是两国友好往来的历史，也是如今两国人民持续巩固“中泰一家亲”共识的基础。

此外，泰国华人在泰国社会的融入、贡献与影响也是中泰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描述贯穿各个阶段的历史教材之中，具体如下：

泰国的显著特点之一在于其包容性……因此，中国人热爱泰国并在此扎根，与泰国女性结婚并生儿育女，代代传承，最终成为如今的泰国华裔。^③自第二次阿瑜陀耶城陷落之战起，至拉玛一世统治时期大约二十年间，泰国人口大幅减少。迁移来的中国人，无论是临时的还是永久的，都为泰国在恢复之际增加了劳动力。大约在1822年拉玛二世时期，全泰总共有大约279万人口，其中有44万中国人，并且每年会有超过1万中国人迁移到泰国，他们挖运河、做园艺、造船、制糖、采矿、从商、在政府任职，甚至担任税务官……一些华人移民成为泰国重要的统治力量，甚

① 乌提猜·孟辛、纳隆·普安皮：《历史》（初中三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4页。

② 乌提猜·孟辛、纳隆·普安皮：《历史》（初中二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83页。

③ 乌提猜·孟辛、纳隆·普安皮：《历史》（初中三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8页。

至成为贵族……^①

教材中强调华人移民对泰国社会的贡献，同时也客观记录了部分华人移民走私违禁品或贩卖鸦片的犯罪行为。伴随着大量华人移民而来的中国文化对泰国社会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泰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对此也有不少描述：“自大城王朝时期移民至泰国的华人带来了他们的文化，促使中国文化在泰国社会广泛传播。比如，华裔渔民建造妈祖庙并举行祭拜仪式，祈求好运或出海平安。泰国华裔还保留了许多中国传统习俗，例如春节，他们会举行拜神祭祖仪式，与家人一起吃团圆饭共同庆祝新年的到来。”^②

中泰两国山水相依、毗邻而居，自古以来便保持着密切而友好的交往传统，这在泰国历史教材中得到了反复的强调和肯定。朝贡贸易的繁荣与华人移民的融入，共同织就了两国之间紧密而持久的历史纽带。这段积极、良性的共同历史记忆无疑是中泰关系不断发展壮大的宝贵财富，为“中泰一家亲”的持续深化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成为中泰两国人民情感认同的重要载体。

（五）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文化传播者与重要贸易伙伴国

古代中国的贸易活动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重要动力与渠道，而中华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广泛传播又进一步深化了双边的贸易联系与文化交流，共同塑造了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积极形象。泰国历史教科书中对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形象描写仍以古代阶段为主，呈现出一个文化繁荣、经济活跃、政治稳定的大国形象。中国的文化传播和贸易活动所带来的影响力为东南亚的历史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中泰乃至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具体表

^① 乌提猜·孟辛、纳隆·普安皮：《历史》（初中三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 2012 年版，第 26 页。

^② 乌提猜·孟辛：《历史》（小学三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 2024 年版，第 46 页。

述如下：

中华文明对泰国和东南亚地区的影响由来已久，主要通过教育、宗教、贸易以及朝贡制度进行传播。

(1) 文学方面，诸如《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中国文学作品在该地区广泛传播。

(2) 贸易与航海方面，中国人在贸易和航海领域拥有卓越的技艺，而东南亚国家出于与中国进行贸易的需求，为了获得跨国贸易的收益，纷纷遵从中国的贸易规则……依赖中国人进行航海活动，采用中国的航海技术……

(3) 宗教方面，中国的大乘佛教及文化随着中国商人和华人移民的脚步传入东南亚地区，该地区逐渐形成了祭拜祖先、敬奉神明、素食习惯以及庆祝春节等习俗。

(4) 艺术方面，越南吸收了中国的建筑和美术风格，而泰国则受到了中国绘画和陶瓷技术的影响。例如，在大城府的拉差布拉那寺（Wat Ratchaburana）的壁画中，可以看到穿着中国服饰的天女形象，画面中还有汉字题记。

(5) 生活习惯方面，泰国及东南亚地区的居民吸收了中国诸多文化习俗，包括烹饪炒菜、炒锅和筷子的使用、饮茶习惯、使用桌椅纸张等生活用品。^①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互动中，文化传播相伴而生，影响了东南亚社会的多个层面。泰国对中国文化元素的接纳与吸收，不仅促进了中华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而且催生了各具特色的文化风貌。泰国中小学历史教材还提及：“泰国语中也夹杂了部分中文词汇，有些词汇甚至采用了中文音译。”^② 例如，“จิมทอง”（进贡）直接采用中文读音，“ไต้ก๋ง”（舵手）与“สำเภา”

① 乌提猜·孟辛：《历史》（小学五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 2024 年版，第 25 页。

② 同上，第 25 页。

(船上的管账人)则源自福建方言。这些词汇不仅是语言交汇的产物,更是中泰两国长期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的生动见证,反映了中国移民在泰国社会的深度融入,以及中国文化元素在泰国社会中的保留与传承,成为两国历史往来的文化印记。

此外,泰国初中历史教科书,对于该国土地上曾经存在的古国,如罗斛(Lavo)、狼牙修(Langkasuka)、单马令(Tambralinga)以及室利佛逝(Sri Vijaya)等的介绍,都特别强调了它们与中国和印度的紧密贸易联系。^①例如,书中提到,“最初,室利佛逝因其作为中国与印度的海上贸易枢纽而繁荣……大约在十至十一世纪,中国开始建造远洋船只,直接与其他城市进行贸易,导致室利佛逝的中介地位逐渐削弱,其在海湾地区的势力也相应衰退。但这一变化对泰国南部海湾地区的其他城市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的直接贸易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许多新兴城市因此兴起。”^②这反映了泰国教科书对中国古代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实力及其广泛影响力的认可与重视。

五、泰国现行中小学历史教科书

塑造中国形象的原因分析

历史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普及历史常识,还服务于巩固政治体制合法性的现实需要。历史教科书作为基础教育过程的媒介,承载着传递国家教育理念、历史文化观念与身份认同的重要使命。泰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是否、如何以及为何塑造中国形象,既是泰国对自身国际地位的定位以及它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的反映,也是中泰两国历史关系变迁的某种镜像,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们理解泰国特定代际群体评判中国及其同中国交往模式的认知根源。^③

① 乌提猜·孟辛、纳隆·普安皮:《历史》(初中一年级),阿科松·乍伦塔特有限公司 2024 年版,第 54 页、第 60—61 页。

② 同上,第 62 页。

③ 孟钟捷:《外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进展与革新方向》,《外国问题研究》,2023 年第 3 期,第 4 页。

（一）服务于泰国主体性叙事

历史教育的核心功能在于借助历史教科书的形式，构建“我们是谁”的国家认同。泰国历史教科书以“泰国主体性”为叙事核心，其中塑造的中国形象本质上是界定和强化泰国“自我”的工具化“他者”。其叙事重心并非在于完整还原中国历史全貌，而是在于依据泰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体性需求，对涉华素材进行筛选、裁剪和阐释，进而生成一个始终服务于泰国自身叙事逻辑的中国形象。中泰两国地缘相近，历史上佛教传播、朝贡贸易与华人迁移等因素促成双方长期密切往来，因此中国是泰国历史教科书中必然涉及的“他者”，但呈现的形态却随着泰国自身需求与安全考虑而动态演变。古代时期的中国被塑造为“文明古国”，其主要功能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借助中国史料为泰国早期历史提供文献佐证，满足泰国构建自身的历史深度与文化连续性的需要；二是强调中华文明对泰国影响深远的同时，始终强调泰国的主体能动性，即中华文明元素通过贸易与移民传入后，在泰国社会落地、转化与再创造，最终内化为“泰国性”的一部分。涉华内容聚焦于古代是泰国的一种安全叙事策略，时间距离消解了政治敏感性，丰富的文献提供了充足的素材，颂扬古代中华文明成就也最不易引发争议，从而能够高效、低风险地为泰国历史文化构建辉煌的源流。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国力衰退与区域影响力下降，中国在泰国自我叙述中的“工具性”价值发生转变。教科书大幅缩减有关近代中国的内容，以“内忧外患的衰落帝国”形象反衬泰国在殖民浪潮中“维持独立”的外交韧性与国家成就。当代中国的相关叙事高度聚焦于“经济奇迹”，将中国塑造为一个“经济强国”“合作伙伴”的形象，符合泰国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加强区域合作的现实需求，折射出两国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与未来合作愿景。

综上所述，泰国历史教科书中“厚古薄今”“重经济轻政治”的中国形象，正是其“工具化他者”叙事逻辑的产物。该形象伴随泰国主体性叙事的需要而被不断调整，服务于泰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定

目标。

（二）维护“民族、宗教、国王”核心价值体系

教科书中的国家形象构建，深受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是特定政治意志与文化思潮的投射。^①泰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涉华叙事，本质上是经过其国内主导意识形态过滤与重塑的结果，最终服务于巩固自身意识形态合法性与再生产的目标。泰国社会凝聚力的根基在于对“民族、宗教、国王”三位一体价值的高度认可。教科书中的涉华叙事必须严格维护这一价值体系，因此倾向于淡化或回避近代中国以革命和社会剧烈变革为主的历史脉络。这一叙事选择，更深层次源于中泰两国近代史叙述逻辑的根本差异：中国形成的是“屈辱—觉醒—救亡—复兴”的抗争型民族主义叙事，其凝聚力来自对殖民压迫的集体反抗；而泰国历史教科书则将其在西方殖民压力下的妥协行为塑造为国王“以妥协保主权”的现实主义智慧，形成以“国王智慧与国家独立”为核心的叙事逻辑。此逻辑下，塑造一个通过“革命”重生的“他者”形象，无益于泰国自身的历史认同；相反，构建一个“衰落”的中国形象，方能有效反衬泰国在同一时期维持独立并推进改革的“政治智慧”与“历史成功”，从而强化其官方叙事的正当性。因此，中国近代诸多涉及思想启蒙、民族觉醒与社会革命的关键事件，在教材中被高度简化，根源在于此类内容与泰国“民族、宗教、国王”核心价值体系存在深刻张力。例如，辛亥革命仅被表述为“1912年，中国确立共和制度”，其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内核、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鼓舞作用等均被剥离于叙事之外。近年来，泰国国内已出现主张改革君主制且获得较高支持率的政治力量（如已被解散的前进党）。在此背景下，教科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关键场域，其涉华叙事须剔除他国历史上一切可能引发类比或联想的思想与运动，防止历史知识成为质疑当下权力结构的认知来源。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个被剥离

^① 耿希、刘学智：《国外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的理论基础》，《教育研究》，2020年第1期，第33页。

了抗争维度、仅剩“衰落”外壳的近代中国形象，而这恰恰是泰国为维护自身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稳定所必需的叙事结果。这一系列对“他者”历史的筛选与重塑，其根本指向是维护“民族、宗教、国王”这一现行价值体系与权力结构的合法性。

总结而言，泰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通过一系列叙事筛选与框架设定，使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契合并强化泰国国内的主流价值观与国家身份认同，从而在历史知识传授中完成意识形态的再生产。

（三）受西方中心主义历史教学范式影响

泰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涉华叙事，呈现出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由此塑造出的中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片面、失真的问题。这一倾向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起，泰国为免受西方殖民，开始主动、系统地学习西方。自拉玛四世开风气之先，至拉玛五世系统推进涵盖行政、法律、教育、军事和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西化改革运动，西方文化与思想逐步渗透至泰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此后，泰国历届领导者持续以西方发展模式为参照，这一连续性的学习过程使得西方模式与观念深嵌于泰国精英阶层的认知之中——“国际化”在相当程度上被等同于“西方化”。泰国精英阶层对西方现代化的追求，清晰体现在銮披汶·颂堪执政期间大力推行的“文化民族主义”政策中。该政策将“泰国特性”融合“西方样板”，创造出了一种“西方化的泰国文化”，其最终目标是推动泰国文明程度能够达到以西方为参照的“国际化”水平。^①在此政治与文化导向下，依据西方史学范式来叙述世界历史是顺理成章的选择。深受銮披汶重用的銮威集·瓦塔干（หลวงวิจิตรวาทการ）是一位兼具强烈民族主义情怀与西学背景的历史学家。他在1929年至1931年间编写并出版了首套泰语版《世界历史》丛书，以西方历史观为中心，叙述了包括泰国、东南亚各国、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历史，被确立为泰国学习和推广世界历史的标准框

^① 金勇：《泰国銮披汶时期的文化政策及其意涵》，《东方论坛》，2013年第5期，第41—43页。

架，对泰国产生了持续、长久的影响。^① 1937年，由暹罗贵族蒙昭通滴卡育·通亚（หม่อมเจ้าทองทิมาฯ ทองใหญ่）编纂的大学《世界历史》教材，同样按西方教科书模式叙述世界与人类的起源，也详尽地叙述了中国和印度的历史。冷战期间，美国通过渗透泰国高等教育体系，在大学人才培养过程中灌输西方思想，进一步深化西方世界观在泰国知识体系中的影响力。^② 1956年，由西里·本集（สิริ เปรมจิตต์）编著的《世界史》参考了英国历史学家H. G. 威尔斯（H. G. Wells）的著作。^③ 1976年，泰国法政大学历史学教师素集达·乌迪塞（สุจิตรา อุทิศเกียรติ์）等人在美国资助下，编译并出版了《世界历史》，并将其作为该校大学历史课程的教学素材。这版教材的内容改编自加拿大历史学家（William H. McNeill）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不少泰国高校借鉴了这一课程。西方文明对世界历史的经典叙事通常遵循以下线性演进框架：从史前文明开始，经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奠基，继而发展为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随后进入中世纪时期，经过文艺复兴、科学革命的转折，步入工业革命与帝国主义扩张时代，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最终形成战后国际秩序。由于泰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者主要是本国高校教师，因此这种对于“世界历史”的西方中心主义叙事范式也逐步渗透至泰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历史教学之中。^④ 从泰国现行高中《世界历史》教材的叙事结构来看，依然遵循上述范式，将“世界历史”等同于“西方文明的崛起与全球化的历史”，将现代世界文明发展的解释权建立在西方文明范式之上。这种深植于泰国历史进程中的认知框架，构成了如今泰国历史教科书看待世界、叙述他国时难以摆脱的深层滤镜。因此，书中将近代中国片面地描绘为“衰落”和“需要被拯救”的被动客体，忽视了近现代历史上中国对亚洲进步和发展作出积

① 瓦查拉·辛德胡帕尔玛、陈玉珊：《20世纪泰国对世界史的认知与教育》，《世界历史评论》，2021年第4期，第193—194页。

② 同上，第194—196页。

③ 瓦查拉·辛德胡帕尔玛：《西方世界关于“世界史”概念的发展：世界史与全球史》，《法政大学历史学期刊》，2016年第1期，第88—89页。

④ 瓦查拉·辛德胡帕尔玛、陈玉珊：《20世纪泰国对世界史的认知与教育》，《世界历史评论》，2021年第4期，第196页。

极贡献的历史事件，诸如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均未被提及。这类片面叙事不仅简化了中国历史的复杂面貌，还可能导致学生对相关史实的理解有失偏颇。

综上所述，西方中心主义历史教学范式至今仍在泰国教育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泰国的历史教科书在呈现他国历史时，往往不自觉地沿袭这一视角，进而持续影响着代代泰国青少年对非西方国家的认知与评价。

（四）编写团队的主观倾向及其中国研究人才不足

泰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涉华叙事，不仅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塑造，也与其编写机制和编写团队自身的知识背景密切相关。具体而言，教材的编撰出版模式、编者的主观倾向以及团队专业人才构成的局限，共同影响了涉华内容的准确性与全面性。

首先，泰国教科书编写、出版及选用模式的特殊性，为编者构建具有主观倾向的叙事留下了空间。泰国中小学教材多由营利性出版社或教育公司依据泰国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各科课程大纲来编写。出版社和编者在材料选择、内容组织和叙事角度上具有较大自主权，可依据个人观点、教育理念和经验构建教材体系，教育部对具体内容的制定不加干预。^①尽管教材须通过教育部审定，但审定过程主要关注教材是否符合教育部课程大纲的总体要求，而非对历史事实的精确性和叙述的全面性进行深入核查，使得编者的主观看法、知识结构与价值倾向可能直接渗透到教材的叙事中，导致部分内容出现偏误。

其次，编写团队中中国研究专业背景的不足，进一步制约涉华叙事的科学性与时效性。本套历史教科书是由泰国阿科松教育集团下属出版社根据泰国教育部2008年颁布的《基础教育核心课程》编写并出版，广泛用于泰国中小学的历史基础教育中。该教材的主要编者乌提猜·孟辛副教授（วศ.วิฑูรย์ มุสิกศิลป์）的研究领域涵盖泰国、中国和日本历史，他也是主编团队中唯一一位具有中国留学背景的成员，但其留

^① 蔡昌卓主编：《东盟基础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页。

学时间较早且仅有一年（1984—1985年间曾在北京语言大学进修），对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变迁缺乏持续、系统的观察。同时，编者团队中其他成员拥有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长期留学经历，其思想和学术视角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在解读中国历史时难免带入西方中心视角。整体而言，团队中缺乏精通中国历史、具备扎实当代中国研究背景的学者，导致在史料搜集、文本翻译与内容审定方面存在一定难度，难以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国历史的复杂脉络与当代现实。

综上所述，泰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涉华叙事既受到编写出版模式留下的“主观空间”的影响，也受限于编者团队专业知识背景的限制。两者叠加之下，使得涉华叙事内容呈现出一定的片面性与滞后性，这也说明，历史教科书的叙事偏差，不仅源于意识形态的筛选，也与其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知识建构条件密切相关。

六、结语

泰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涉华叙事总体呈现出客观、友好的基调，积极肯定中国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成就，并从正面评价中国文化对泰国、东南亚乃至世界的深远影响。然而，在涉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部分，仍存在表述不够准确、内容相对片面或更新滞后等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泰国青少年形成全面、客观、立体的对华认知。为促进泰国中小学生学习形成更为客观、全面的对华认知，并在充分尊重泰国教育主权的前提下推动教科书内容的完善，建议从以下三个层面系统展开合作与交流。

其一，深化中泰两国历史学界的对话与共同研究。鼓励中泰两国历史学者、教师建立常态化的交流机制，通过联合研究、学术研讨会、专题工作坊等形式，就涉及两国历史的重要议题展开平等对话。中方可通过学术机构、智库或民间文化交流组织，系统整理并提供关于中国历史与发展的多语种权威文献、影像资料及最新研究成果，供泰国教育工作者参考。同时，可协助泰方培养熟悉两国历史与文化的学者与教师，例如设立专项研修项目、提供访问学者名额等，支持两国在

历史教育领域开展客观、平衡的叙事探索。也可邀请泰国教科书编写与评审专家来访中国，参访历史遗址、档案馆及现代发展成果，增进其对中国历史脉络与当代中国的全面了解。在此基础上，可探讨建立跨区域历史研究数据库的可能性，以期在历史教育与研究领域达成更加全面、深入的合作。

其二，构建中泰两国教育领域的长效合作与沟通机制。在与泰国教育部、学术机构及出版界保持友好沟通、本着相互尊重原则的基础上，共同探索历史教科书涉华内容方面展开双边合作编写的可能性。可鼓励泰国相关机构自主开展教材评估与更新，中方在其需要时提供资料、人才方面的支持，共同推动涉华内容向更加客观、全面、与时俱进的方向发展。

其三，拓展中泰两国多元文化传播与民间交流渠道。除教科书之外，应积极借助新媒体、影视作品、文艺演出、文化节庆等多元形式，拓宽泰国普通民众认识中国、感知中国的渠道，向泰国社会展现真实、立体、发展的中国形象。针对青少年群体，可进一步扩大中泰学校间线上课程、夏令营、研学旅行及体育文化交流等活动的规模与深度，鼓励更多泰国学生来华学习交流，在来华亲身体验中提升对中国形象的客观认知。

通过上述方式，既能尊重泰国教育自主权，又能以合作促理解，助力泰国青少年形成更加积极、全面的对华认知，使中泰友谊的种子在年轻一代心中生根发芽，为中泰两国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筑牢民意基础。

[责任编辑：郑佳]